

## For Old Time Sake

送妳的那張自製光碟，選錄的都是陪我走過成長期的老歌。妳在越洋電話裏問我民國四十八年離開光復中學後的種切，我腦中浮現的竟是那些音符。

開始聽西洋流行歌曲是民國四十七年，我十四歲，剛從空軍幼校退學回家，插班入私立光復中學的前後。高三有幾位住讀的學長組了個克難樂隊，偶爾還會在小城的中山堂演出。承他們不棄，有回還叫我去客串，吹口哨「桂河大橋」進行曲。就在這段時間，英語流行歌壇竄起了一顆和我們年齡相若的新星 Paul Anka。一時間，他的“Diana“和“I love you baby“就響徹了大街小巷，成了我翹課、逛彈子房，看電影、打架惹事的背景音樂。

皮得過了火的結果，是讓法官老娘效「孟母三遷」故事，把我在升高二時轉學到了座落於台北新莊的恆毅中學，冀望教會學校的嚴格住宿管理能收服我這匹脫韁野馬。一開始，軍訓教官看我這個受過幾天軍校訓練的轉學生軍事動作還不錯，就委我做住讀生的「中隊長」。本來，教官的意思是要「以夷制夷」，找個幫他管理同學的小嘍囉罷了。而我這不識相的毛頭小子卻把這傀儡的角色演成了代表學生權益和校方相抗衡的「工會頭子」。這一年中，我是頗受同學擁戴的，但在校長，訓導、教務兩大主任，教官，舍監和那位整天拿著根板子，憋著學生的劉修士心目中，我很快地就成了「問題份子」。他們是以「天主之聖名」在對付我這個叛逆之徒；而我這滿腦子英雄主義幻想的小刺頭，卻認為是在獨力對抗惡勢力，其悲壯的程度絕不下於塞萬底斯筆下的唐·吉軻德。學年結束前，校長通知老爹，他的「公子」被勒令轉學了。



叛逆少年

在這一年裏，受到幾位愛熱門歌曲的同學的耳濡目染，我也進入西洋歌曲的領域。那年頭，歌本可是買不起的。於是，能借來抄的就抄，沒得抄的就邊聽邊寫，不懂的字就查字典。同寢室同學中，有一位有具電晶體收音機。從那美妙的小黑盒子中， Brenda Lee 充滿野性的 „Sweet nothings“， Connie Francis 蜜糖般嗲音的“Frankie“， “Lipstick on your collar“， 黑人歌手 Sarah Vaughan 渾厚的 „Brokenhearted melody“ 和 Pat Boone 的 „April love“不知伴我們渡過了多少炎熱的夏夜。

校長室有套播音系統，主用途是宣導校令，偶爾也放些神曲和聖歌，尤其那首“Ave Maria“更是范校長的最愛，每天晨昏都要放上好幾回。而突然有那麼一天的課後休息時間，擴音器中竟響起了 Ricky Nelson 的“Traveling man“。當時覺得：校長「從保羅成爲掃羅」。幾十年後想想：那寬鬆教士黑袍裏的人，不也是有血有肉，才四十出頭的壯年漢子嗎？

新竹一中的轉學考試，是「降格錄取」，講白了就是重唸一遍高二，跟留級是沒有分別的。在台北留了一年學回來，帶了一大本手抄的歌本和一把破得可以的吉他，很快地就帶動了一堆氣味相投的朋友，常在一起彈彈唱唱，最後還開風城風氣之先，組了個名叫「Sweetheart」的熱門歌曲合唱團。我們的初試身手，是上了中廣新竹台郝履文阿姨的節目，唱了一首三重唱 Tom Dooley，還以一支小喇叭、一把小鼓，演奏了電影「慕情」的主題曲“Midnight Blues“。這年的行憲紀念日(12月25日)，中山堂有個慶祝晚會，我們竟也應邀上台唱了幾首耶誕歌曲(下圖)，而這也是「甜心合唱團」的告別作了。



民國五十一年，就像早年一部中廣廣播劇的情節，我這個「多行不善」的小子自動請纓，進了陸軍官校。一頭桀驁不馴的野馬，登時成了被學長們競相磨煉的「人下人」。學校有一套高瓦數的播音系統，那位二十出頭的播音小姐想是跟我們口胃相同吧。多次在閱兵台前灰頭土臉，汗血交織地爬碳渣跑道和在大操場長滿「黃埔豆」的草地上「滾進」時，傳入耳中的，竟是美黨的「藍色街燈」或 Brian Hyland 的“Ginny comes lately”。這年，四年級的黃永樑學長在輕音樂隊裏組了個西洋歌曲合唱團，把曾精忠和我給拉了進去。精忠和我的二重唱，不止唱了軍校的四年。2010 年秋，我們還在台北舉辦了一場 Reunion 的演唱會。



Roses are red



Blowing in the wind

軍校是變化氣質的地方。進了軍校的我，自此「改邪（斜）歸正」。以後的人生，自有幾番「栽花種柳」，因緣際會，但少年的情懷是一去不復返了。